

雙雙鵠立陵闕間 劍痕馬汗模糊殷

—唐太宗與昭陵六駿瑣談

／劉向陽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五九九—六四九）

與文德皇后長孫氏的合葬陵，位於陝西省禮泉縣城東北二·五公里處的九峻山主峰。九峻山地處涇河之陰，渭河之陽，其主峰由九道山梁拱聚而成，海拔一二二四·九米。（註一）山南陡峭突兀，東西溝壑縱橫，遠觀氣勢磅礴，層巒起伏。昭陵以九峻山主峰為陵，是李世民生前親自選定的。唐朝建國初期，李世民經常率軍出征，他曾多次路過九峻山；唐的統一大業完成後，他又經常在九峻山一帶畋獵，對這裡的山川地貌不但十分熟悉，而且喜歡上了它。貞觀初年，唐太宗對侍臣說：「昔漢家皆先造山陵，既達始終，身復親見，又省子孫經營，不煩費人工。我深以此為是。古者以山為墳，此誠便是，我看九峻山孤聳回繞，因而傍鑿可置山陵處。朕實有終焉之理。」（註二）貞觀十年（六三七）六月二十一日，文德皇后長孫氏去世，唐太宗便下詔，令營建昭陵。貞觀二十三年（六四九）五月二十六日，太宗駕崩，高宗李治遵照太宗遺願，葬太宗於九峻山，曰昭陵。

昭陵開創了唐代帝王「因山為陵」埋葬的先例，這一埋葬形式到此後的唐高宗李治與女皇武則天乾陵時成為定制，並且成為後世諸帝陵營築的楷模。昭陵陵域封內六十公里，占地三十萬畝，從首葬文德皇后到埋葬太宗，營建了十三年之久。這十三年間，除在陵山周圍營造了規模宏大的地面建築群以外，又在陵山北麓設置了兩組反映太宗李世民創建唐朝的功績和與周邊國家、民族友好關係的巨型石刻。其中最著名的是太宗生前騎過的六匹戰馬浮雕，號稱「昭陵六駿」。

昭陵六駿是唐太宗李世民在削平群雄建立唐王朝的征戰中所乘六匹坐騎的寫真石雕，是馳名中外的浮雕藝術品。貞觀十年十一月，文德皇后長孫氏葬昭陵後，李世民為了彰顯自己的開國武功，宣揚英勇，命閻立德、閻立本兄弟，把他在初唐征戰年代齒唇相依、生死與共的六匹戰馬繪成圖稿，用大塊青石刻成浮雕，陳列在陵山北闕。石刻六駿原列置於陵山北闕前的石台基上，後世整修時移置於北闕東、西的兩廡之中。由北往南，東廡依次是什伐赤、

青騮和特勤驃；西廡依次為白蹄烏、拳毛騧和颯露紫。六駿分別雕鑿在六塊高一·七〇米，寬二·〇五米，厚〇·三〇米的長方形青石屏上，石屏右上角或左上角有唐太宗自題讚語，由大書法家歐陽詢（五七七—六四一）書丹於石。

據《全唐文》（卷十）收錄唐太宗（六馬圖贊）記載，駿馬「白蹄烏」是武德元年（六一八）九月至十一月間，李世民與薛仁杲（薛舉之子）在淺水原（今陝西長武縣東北）作戰時的坐騎，列於昭陵陵山北關西側三駿之首位（由北往南排列）。該馬通身毛色純黑，四蹄俱白。隋大業十三年（六一七）四月，薛舉、薛仁杲父子在金城（今甘肅省蘭州市）郡起兵。

十二月，薛舉父子出動十萬大軍，想趁李淵父子立足未穩，奪取關中長安。次年六月，薛仁杲率大軍佔領涇州（今甘肅涇川縣北五里），後一直開到豳州（今陝西彬縣）、岐州（今陝西岐山、扶風、鳳翔境內）一帶。唐高祖李淵封李世民為西討元帥，出兵抗擊。兩軍在高壩城（今陝西長武縣北）一帶相持了兩個多月。



九峻山遠眺



昭陵北關西側現存三駿基址

十一月，薛軍糧草不濟，軍心浮動，進退兩難。李世民看準戰機，先用少量兵力在淺水原誘敵，拖住薛軍精銳羅侯部，然後連夜調兵遣將，出其不意，親率勁旅直搗敵後。他騎著「白蹄烏」，只帶了數名精銳騎兵，率先殺入敵陣，薛軍大亂，兵卒向折墟城（今甘肅省涇川縣東北）潰逃。為徹底消滅敵人，李世民又催動「白蹄烏」，帶領兩千餘名騎兵緊緊追趕，一晝夜奔馳二百多里，把薛仁杲敗軍圍定在折墟城內，扼守關口要道，迫使薛仁杲率殘部開城投降。淺水原大戰奠定了唐王朝立足關隴的基礎。石刻「白蹄烏」筋骨強健，四蹄騰空，鬃鬣迎風，呈疾速奔馳之狀，足見它當年載著

李世民在黃土高原上急馳，追擊薛軍的情景。唐太宗給它題的讚語是：「倚天長劍，追風駿足，聳轡平隴，回鞍定蜀。」

關於「白蹄烏」的命名，千百年來，人們一直持是一匹有四隻白蹄的純黑色駿馬的說法。葛承雍先生經過充分考證後認為，作為「天可汗」唐太宗建立赫赫戰功的坐騎專名和讚美之稱，「白蹄烏」的命名不足以說明李世民豐功偉績的含義。他認為，「白蹄」二字來源於突厥語「bota」，意為幼馬或幼駱駝，是「少汗」之意。「白蹄烏」應是一匹冠以突厥語「少汗」之意的榮譽性專名的坐騎，「在立有戰功的黑馬名稱前帶有讚美的稱銜或加諸各種高貴的官號，其象徵意義不僅符合突厥歌頌上層領袖坐騎的習俗，而且也符合唐人頌揚聖皇名君的傳統作法。所以，突厥語「少汗」(bota)應該是漢語『白蹄』真正的原意。」(註二)這一結論得到目前學術界的普遍贊同。

駿馬「特勤驃」是武德二年十一月至次年四月李世民消滅割據馬邑(今山西朔縣境)的劉武周勢力，收復河東失地時，與劉武周大將宋金剛等作戰時的坐騎，排列於昭陵北闕東側末位。此馬毛色黃裡透白，喙微黑色。劉武周(?—一六二二)本隋河澗景城(今河北獻縣東北)人，隨父遷馬邑。後任馬邑鷹揚府校尉。大業十三年(六一七)殺太守王仁恭，自任太守，遣使附於突厥，受封為「定揚可汗」，割據馬邑。武德二年三月，乘唐軍與薛仁杲作戰

之機，勾結突厥向南侵擾。其將宋金剛部數日間攻陷介州，唐軍數敗。守禦太原的齊王李元吉棄城逃回長安。於是，劉武周、宋金剛佔據了唐在山西的大片土地和軍事要地太原。高祖李淵大驚，打算放棄黃河以東地區，收兵鎮守關中。惟李世民堅決反對，他認為失掉了河東，關中就孤立了，只有消滅劉武周勢力，收復河東失地，才能久據關中。李淵遂派李世民帶兵狙擊。十一月，李世民率眾直趨龍門關，渡黃河，連挫劉武周軍前鋒。唐軍在柏壁(今山西新絳縣西南)集結，與宋金剛對壘。李世民採用「堅營蓄銳，以挫其鋒，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的戰略戰術。武德三年二月，宋金剛軍果然糧盡計窮，軍心動搖，李世民率大軍乘機窮追猛擊。在消滅宋金剛、尋相、尉遲瓌德等劉武周勢力中，李世民騎著「特勤驃」，曾一晝夜間急追二百多里地，交戰數十次。在雀鼠谷(今山西介休縣西南)西原，一天連打八次硬仗。這次追殲，李世民一連兩天水米未進，三天人沒解甲，馬沒卸鞍。石刻「特勤驃」體形健壯，腹小腿長，屬突厥名馬。這種馬是典型的錫爾河流域的大宛馬，即漢代著名的「汗血馬」，也是隋唐時期中原人尋覓的神奇駿馬之一。研究者認為，「特勤」是突厥汗國的高級官號之一，其地位次於葉護和設，只統部落，不領兵馬。「唐太宗以突厥『特勤』官號來命名自己的坐騎，不僅僅是為讚揚名品良種的駿馬，更重要的是以突厥讚美英雄、勇士的風俗來紀念和炫耀自己的輝煌戰績。」(註四)



昭陵六駿——白蹄烏



昭陵六駿——特勤驃



昭陵六駿——颯露紫（複製品）

突厥多以王室子弟為「特勤」，「特勤驃」亦可能是突厥可汗的一個子弟進獻的。它載著李世民馳騁汾晉，為收復大唐王業發祥地——太原和河東失地，立下了戰功。因此，唐太宗李世民稱讚它：「應策騰空，承聲半漢，入險摧敵，乘危濟難。」

「颯露紫」是李世民東征洛陽，鏖平王世充勢力時的坐騎，列於陵園北關西側末位，前胸中一箭。「颯露紫」是六駿之中唯一同伴人像的。據《舊唐書·丘行恭傳》（卷五十九）記載，李世民與王世充在洛陽邙山的一次交戰中，為了探清對方實力，他自己跨上「颯露紫」，只帶了數十名騎兵，猛衝敵陣，殺開一條血路，一直衝到敵陣背後。因為來勢太猛，

王世充軍被衝得暈頭轉向，一片慌亂，幾乎無人敢擋其鋒。李世民只顧猛衝，和隨從將士失散，只有將軍丘行恭一人緊隨其後。突然，一條長堤橫在面前，圍追堵截的王世充騎兵又一箭射中戰馬「颯露紫」，在這危急關頭，大將軍丘行恭急轉馬頭，向敵兵連射幾箭，隨即翻身下馬，把自己的坐騎讓與李世民，自己一手牽著受傷的「颯露紫」，一手持刀和李世民一起「巨躍大呼，斬數人，突陣而出，得入大軍。」回到營地，丘行恭為「颯露紫」拔出胸前的箭之後，「颯露紫」就倒下去了。李世民為了表彰丘行恭拼死護駕的戰功，特命將拔箭的情形刻於石屏上。石刻「颯露紫」正是捕捉了這一瞬間情形，中箭後的「颯露紫」垂首偃

人，眼神低沉，臀部稍微後坐，四肢略顯無力，劇烈的疼痛使其全身顫慄，同伴的丘行恭正在拔箭。這種救護之情，真乃人馬難分，情感深摯。李世民爲其題贊文曰：「紫燕超躍，骨騰神駿，氣聳三川，威凌八陣。」

關於「颯露紫」的含義，人們一般依據唐太宗所題的讚語「紫燕超躍，骨騰神駿」來描繪這匹坐騎像一隻輕健飛奔的純紫色燕子。葛承雍先生研究認爲，「颯露」一詞來源於突厥語，將「颯露」的讀音還原爲唐代域外的非漢語辭彙時，對應漢譯爲「沙鉢略」、「始波羅」。在《通典》（卷一九七）所載突厥十等官號、《隋書》紀傳等文獻及突厥碑銘中，「沙鉢略」和「始波羅」常被突厥人用作爲領袖的榮譽性稱號，並將其「勇健者」稱爲「沙鉢略」和「始波羅」，是突厥汗國的高級官號之一。用突厥汗國的榮譽性稱號和高級官號來稱唐太宗的坐騎，既符合對突厥汗國「勇健者」的讚頌，又能表達唐太宗李世民初唐征戰疆場的豐功偉績，體現了唐太宗對突厥「沙鉢略」、「始波羅」者的敬佩之情。所以，「颯露紫」的含義應是「勇健者的紫色駿馬」。

「青騅」爲一匹蒼白雜色駿馬。據岑仲勉、葛承雍等先生考證，有可能是來自西方「大秦」國的駿馬，「青騅」之「青」不是泛指一種顏色，而是來源於突厥文「cin」或「sin」，在漢語中音寫爲「秦」，「秦」、「青」同音，故稱之。據文獻記載，駿馬「青騅」是李世民和竇建德（隋朝末年河北、山東一帶的農民起義軍領袖）在洛陽武牢關交戰時的坐

騎，列於北關東側三駿中間。武牢關大戰，李世民最先騎上「青騅」馬，率領一支精銳騎兵，似離弦之箭，直入竇建德軍長達二十里的軍陣，左馳右擊，打垮了竇建德和十幾萬大軍，並在牛口渚（今河南省汜水縣西北）俘獲了竇建德。一場大戰下來，駿馬「青騅」身上中了五箭（前邊一箭，後面四箭），都是從迎面射來的，足見它奔跑起來迅猛異常。石刻「青騅」呈疾馳之狀，顯示出飛奔陷陣的情景。武牢關大捷，使唐朝初年的統一戰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因此，李世民稱讚「青騅」馬：「足輕電影，神發天機，策茲飛練，定我戎衣。」

「什伐赤」是一匹純赤色駿馬，排列於北關東側三駿首位。關於「什伐赤」的名稱，日本學者原田淑人認爲：「什伐」或譯作「叱撥」，是波斯語「阿濕婆」的縮譯，即漢語「馬」的意思。（註五）按原田淑人的說法，這匹馬是用波斯語命名，那麼「什伐赤」和「桃花叱撥價最殊」（岑參詩句）、「紫陌亂嘶紅叱撥」（韋莊詩句）中的「叱撥」馬，都應是來自西域波斯（今伊朗）的名馬。美國學者費賴伊（R. Z. Frye）研究指出，「叱撥」是粟特人主要用來對馬的稱呼。蔡鴻生先生論證後也認爲「叱撥」或「什伐赤」均爲大宛的汗血馬。（註六）葛承雍先生研究認爲，「什伐赤」是用突厥官號命名的一匹坐騎。他認爲，「什伐」來自突厥語，應對音轉譯爲漢文「設發」，而「設」又有「殺」、「察」、「沙」等異譯。據《通典·突厥上》注釋和《舊唐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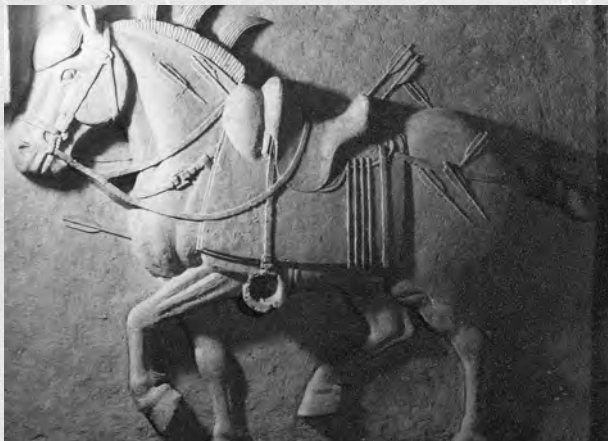
突厥傳》等文獻記載，「設」是突厥別部領兵的將領。任「設」者都是可汗的直系親屬，即所謂「常以可汗子弟及宗族爲之」，（註七）地位在可汗、葉護之下，可以建立牙帳，率領精銳兵馬二萬人左右，專制一方。儘管學術界對「設發」的對譯與含義有許多不同觀點，但大家都公認「設發」或「設」、「失」等是突厥的高級官號。因此，「什伐」就是「設發」（或失發）的異譯，昭陵六駿之「什伐赤」當是用突厥官號命名的一匹坐騎。（註八）據文獻記載，駿馬「什伐赤」是李世民在洛陽城外、武牢關前和王世充、竇建德作戰時的又一匹坐騎。在激烈的戰鬥中，「什伐赤」身中五



昭陵六駿——青騏



昭陵六駿——什伐赤



昭陵六駿——拳毛騮（複製品）

箭，而且都在臀部，其中一箭是從背後射來的。石刻「什伐赤」呈帶箭飛奔的形象。李世民爲其題讚語曰：「灑（灑河，水名，在河南省）澗未靜，斧鉞申威，朱汗騁足，青旌凱歸。」

「拳毛騮」是李世民武德四年十二月至次年三月平定河北，與劉黑闥（原竇建德部將）在洛水（即漳水，在今河北省曲周縣境內）作戰時所乘的一匹戰馬，列於陵山北關西側三駿石刻中間。馬黑嘴頭，周身旋毛呈黃色，原名「洛仁騮」，是唐代州（今河北代縣）刺史許洛仁在武牢關前進獻給李世民的坐騎，故曾以許洛仁的名字作馬名。許洛仁死後陪葬昭陵，其

墓碑上就記載著武牢關進馬之事。（註九）後人或因馬周身旋毛捲曲，又稱「拳毛騮」。一般認為，馬身若有旋毛是賤醜的，但此馬矯健善走，蹄大快程，貴不嫌醜，故用「拳毛」作馬名，以表彰唐太宗不計毛色，不嫌其醜，善識駿馬的眼光。葛承雍先生研究認為，「拳毛」音源於突厥文「Khowar, Kho」，漢文在《北史》中稱為「權於魔國」，在隋唐古音中語音對譯極為類似。所以，「拳毛」的標準譯名應源於「權於魔」。由此可見，「拳毛騮」有可能是從「權於魔國」來的或者是一匹與「權於魔國」種馬通過人工雜交方式培養出來的大良馬。「拳毛騮」是太宗李世民的坐騎，在初唐平亂中與李世民立下了大功。唐初武牢關大戰後，李淵父子殘害了竇建德夫婦，加之，唐朝一控制河北，就實行了高壓統治。竇建德原部將范願、高雅賢懷著復仇的目的，推舉劉黑闥為首領，在河北一帶起兵反唐。他們攻城陷郡，勢如破竹，打敗了唐朝著名將領李勣，俘虜了勇猛過人的唐將薛萬徹、薛萬備。約半年時間，收復了竇建德原來在河北一帶佔據的大部分土地。

武德四年十二月，李世民又一次奉命出征。他採用堅壁控銳，斷糧築堰的辦法，逼迫劉黑闥率兩萬騎兵南渡洺水，與唐軍殊死決戰。這次戰鬥打得相當激烈，李世民的坐騎「拳毛騮」竟身中九箭（前中六箭，背中三箭），戰死在兩軍陣前。石刻六駿中，李世民給它題的讚語是：「月精按轡，天駟橫行。弧

矢載戰，氛埃廓清。」把它比作神馬。唐代詩人杜甫在他的詩中也曾提到過「拳毛騮」，詩中曰：「昔日太宗拳毛騮，近時郭家獅子花。」獅子花是唐代宗時范陽節度使李德山進獻給代宗李豫的一匹駿馬，這匹馬體毛捲曲似魚鱗，通體有九道花紋，所以又叫「九花虯」。唐代宗把這匹馬賜給了汾陽王郭子儀。詩人把「拳毛騮」與「九花虯」並提，說明兩者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

唐太宗李世民在創建唐王朝時南征北戰，其赫赫戰功與他的坐騎密不可分。在文德皇后葬昭陵後，他即詔令雕刻自己在初唐征戰時的六匹坐騎，借駿馬以炫耀自己的開國功績，這一借駿馬謳歌帝王英雄的壯舉與突厥人的喪葬習俗和宗教信仰有密切的關係。葛承雍先生研究指出，馬為騎射民族的生活與征戰提供了絕對緊密條件。古突厥人一生與馬為伍，他們在馬上建立了龐大的突厥汗國，在突厥人的喪葬儀式中，以馬陪葬英雄是其民族特點。在目前發現的古突厥碑文中，每敘述戰爭勝利時，必涉及可汗或英雄在戰役中所乘之駿馬，並冠以坐騎榮譽性名號，把馬的戰死作為一件大事記錄下來。在可汗或貴族葬儀中更重視良馬的象徵意義，正是騎射民族的特色與風俗。他還指出。突厥人對高山的崇拜與其對祖先的崇拜習俗影響了唐初的陵墓制度。突厥人認為「祖先亡靈的理想住宅是高地或最好是高山，因為在高山容易接受天神（即日神）的照耀」，「拜山即拜祖，因之山神在突厥神靈體系中佔

功成鏘八鸞，玉輅行天街；

寂寞昭陵闕，古石滿蒼苔。

據《禮泉縣志》記載，清人張昭曾作《昭陵六駿贊辯》，言其曾親臨昭陵考察，「登九峻甬道，恭謁殿前，上下歷覽……及審視六駿，其制琢石如屏風，每方高四尺五寸，廣五尺五寸，厚一尺，周遭邊界棱起，馬身半鑿空處，剝下三寸。西第一四蹄端立，有馬圍前立拔箭。東第一、西第二則三蹄立，前左一蹄作馳勢，餘三則絕塵而奔。各馬頭之上，一隅留石一尺，正方，與邊界相平，隱隱有字跡，是當日刻贊處也。下座每邊三馬相連，各離尺許，其置一座，座面之石即與地平，合縫有鐵錠連屬……」。說明此時六駿仍然屹立在昭陵陵山北闕前的石台基上，唯題刻讚語字跡漫漶，大多不可辨認。

鬥轉星移，王朝更迭，六駿石馬始終默默地守護在陵前，經受著人世間滄桑風雨的摧殘。然而在二十世紀初年，六駿卻遭受了一場劫掠，演繹出一段難言的曲折經歷。關於昭陵六駿被盜賣的經過，郭琦、李新民、武伯倫、傅振倫等有關專家的記述不盡相同。民國三年（一九一四），聞知昭陵六駿盛名的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與盧芹齋·中國藝術公司敲定了盜賣全部昭陵六駿群雕的生意，遂後即派畢士博（Bishop）來華預謀盜運這一組大型文物。這位自詡為「漢學家」、「考古學家」的文化劫掠分子和在北京琉璃廠開「盧芹齋」的大古董商黃訶舫聯繫後，黃即托袁世凱的次

子袁克文寫信，介紹畢士博來陝結識陝西督軍陸建章。在陸建章和地方官吏的庇護下，以二十四萬銀元盜賣了六駿中最優秀的兩駿，即「颯露紫」和「拳毛騮」。于右任先生詩句「石馬先群超海去」說的就是此事。

需要說明的是，現存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的颯露紫和拳毛騮，並不是由禮泉昭陵直接盜運出境的。據《蘇齋雜誌》（卷二）「昭陵六駿」條和《西北革命史徵稿·張雲山傳》記載，辛亥革命後，曾任陝西軍政府兵馬大都督的張雲山，嘗取六駿之二（颯露紫和拳毛騮）移置舊督署（時俗稱南院）。迨至陸建章督陝後，張雲山被削奪兵權，改任陝北鎮守使。陸建章見張雲山「位隆而財多」，遂多方設障不許其赴任。張雲山為保全自己的性命，遂將二駿石雕送予陸建章。陸建章接到袁克文的信後，為表效忠袁世凱之心，接受了袁克文的囑託，幫助畢士博將二駿盜運出境。按《蘇齋雜誌》的作者宋聯奎，民國三年任陝西巡按使，與張雲山為同事，其著文所述張雲山移置昭陵六駿之二於南院之事，必親歷親見，當是實錄無疑。

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夏秋之交，畢士博再次來華，企圖盜運其餘四駿。他又勾結當時陝西督軍陳樹藩之父絲綢商人陳配岳，協助他辦理偷運事宜。由於上次盜賣事件敗露，經辦人遂向群眾謊說將此四駿運往省城保存，但禮泉士紳很不放心，便一直跟隨載運大車。他們沿渭河行至西安城北草灘時，竟把四駿浮雕鋸成小塊裝箱，準備從水路偷運出境，此事幸被

民眾發覺，賊船到潼關時即被截住（一說是在西安草灘裝船時就被群眾扣留）。這時，駐渭河北與北洋軍閥對立的靖國軍聞知此訊，他們立即張貼佈告，譴責陳樹藩盜賣國寶，出賣祖先文物等等。陳樹藩得知此事是其父所為，便將其父的馬弁痛打一頓，並命將四駿碎塊運至西安圖書館保存。美國文化奸商盜運其餘四駿的陰謀才未得逞。四駿雖得以保存，但已不完整。《禮泉縣誌》載邑人曹驥觀〈昭陵六駿歌〉，表現了人們對這件事的痛惜心情，歌曰：

唐家創業掃群雄，馬上得之為太宗。
真人出世姿神武，馳騁縱橫駕六龍。
六龍神駿皆汗血，陷陣衝鋒驚電營。
雙瞳垂鏡權協月，五花連錢蹄蹴鐵。
擒充戮竅西復東，飛鏃血濺鬃毛紅。

帝嘉汝績傳不朽，制贊圖形召石工。
琢成玲瓏氣深穩，丹青惟數間立本。
立仗永置昭陵宮，萬歲千秋表忠悃。
於今陵殿久無主，瓦敗頽垣竄狐鼠。
獨留六駿尚嘶風，猶指唐家一抔土。
何物奸人居奇貨，大車捆載咸陽過。
縱說神物有護持，到此已嗟缺兩個。
我家結廬峻山陽，兒時習見真乘黃。
今日重逢長安市，感時撫事增憂傷。
籲嗟呼！

金人辭漢淚猶流，應知六駿多煩憂。
歌罷不禁三歎息，恍睹石馬向我齊昂首。
一九四九年以後，四駿石塊移交陝西省博物館（今西安碑林博物館）藏展。今天我們在西安碑林博物館石刻陳列室看到的六駿中，「颯露紫」和「拳毛騮」為複製品，其餘四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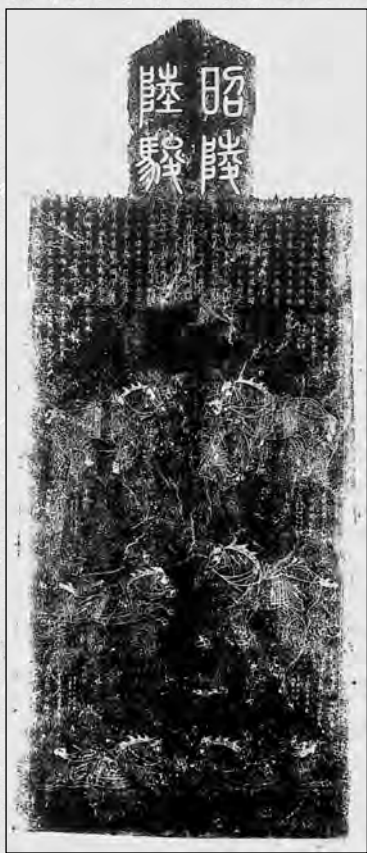
二十世紀三〇年代保存在陝西省圖書館的昭陵四駿

是由碎石塊重新拼接起來的。歷盡磨難的石刻六駿上的題字已看不到了，馬的細部也看不清了。所幸的是，北宋陝西轉運副使游師雄元祐四年（一〇八九）所立的〈昭陵六駿碑〉縮小了原來六駿浮雕的形狀，用線刻的手法記錄了六駿浮雕的細部，同時刻錄了六駿的名稱、毛色特點、參加的戰役和唐太宗六馬贊全文，成為研究六駿的極有權威的資料。今天廣為流傳的昭陵六駿圖形，特別是鞍轡細部和中箭的位置，都是以游師雄所立碑石上的線刻六駿為藍本的。

二〇〇二年九月，供職於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考古與人類學博物館（以下簡稱賓大博物館）的周秀琴女士，將自己多年來收集的關於昭陵兩駿流失美國的全部資料和自一九九五年以來對這一問題進行專題研究的結果重新整理，撰成〈昭陵兩駿流失始末〉（以下簡稱周文）一文。周文公開了昭陵兩駿離開昭陵、西安與北京之始末；兩駿入藏賓大博物館之經過以及盧芹齋、畢士博與賓大博物館等許多鮮為人知的資料，「希冀有助解開撲朔之謎，並促進對昭陵六駿的討論與研究，以增進中美博物館之間的相互瞭解。」（註十一）同時將其中的待解謎團提供給昭陵六駿的研究者，以待有關專家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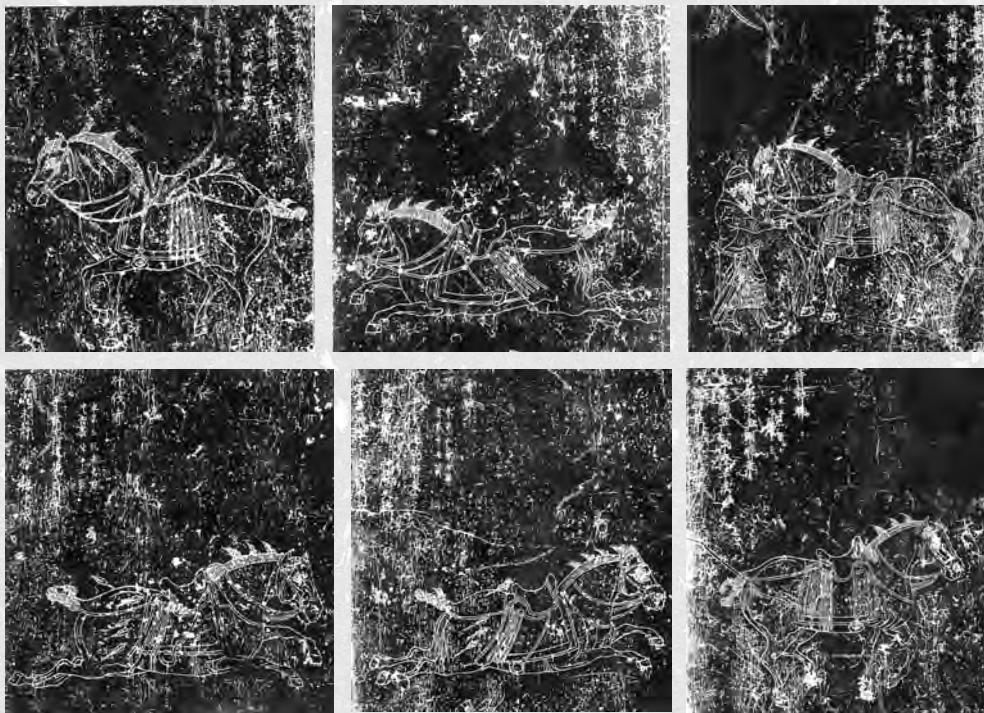
據周文介紹，最早垂誕昭陵六駿的是法國巴黎商人保羅·馬龍（Paul Mallon），他擁有的中

國印度支那進口公司（Importation de Chineses Indes），亦暗中從事進口中國古董的生意。一九一二年，在北京的馬龍合夥人格魯尚（A. Grosjean，法國古董商）搶在德國古董商阿道夫·沃什（Adolf Worth）和馬塞爾·賓（Marcel Bing）的進貨員達爾美達（d'Almeida）之前，派遣了一位名叫戈蘭茲（Galenzi）的助手去昭陵，「指示他以最快的速度最妥的方式將石駿運出當地。」一九一三年五月，石駿被運出昭陵。途中，運輸隊遭到了當地民眾的攔擊，石駿被推下山崖摔碎。民眾將沒收的殘碎石駿托交西安圖書館保存，後被陝西督軍張雲山佔有並移置長安舊督署。一九一四年陸建章督陝，張雲山被削奪兵權，為圖保全，張遂拿兩駿去討好陸建章。兩駿又轉到陸建章手中。與此同時，欲復辟帝制的袁世凱在北京籌建「袁家花園」，與袁家二少爺袁克文結好的北京延吉齋老闆趙福齡（二八八一—一九三六，字鶴舫；一說黃鶴舫），「主動向袁克文提出要為花園建造出點力，計畫從外地運些奇花異



〈昭陵六駿碑〉拓片
圖版採自《碑林集刊》（八）

草、怪石古樹，需要封條作護，袁府的封條如同『皇封』，兩駿暢通無阻地抵達北京。」（註十二）筆者推測，作為古董商的趙鶴舫深知稀世之寶「昭陵六駿」的文化藝術價值，他在向



〈昭陵六駿碑〉線刻畫拓片（局部） 圖版採自《碑林集刊》〔八〕

袁克文討要封條時，可能早已窺中了存放於西安的昭陵兩駿。有了給「袁家花園」運「奇花異草、怪石古樹」的托詞和封條，加上陸建章為表效忠袁世凱之心，又受袁克文的囑託，兩駿自然就會「暢通無阻地抵達北京」，轉入趙鶴舫的手中，其中也可能隱藏著趙欲據為己有的用心。兩駿運抵北京的時間，當在一九一五年初。

兩駿「抵達北京數月後，由他人轉賣給我們。」這是盧芹齋一九二七年九月十日致賓大博物館董事會會長哈里森（Charles Custis Harrison，一八四四—一九二九）博士的信函中說的。盧芹齋（一八八〇—一九五七）於一九〇〇年左右到法國巴黎求學經商，在同鄉、國民黨元老張靜江的提攜和投資下，盧與幾位駐巴黎的中國使館人員一起開辦了通運古玩公司，後來相繼在巴黎、北京、上海和美國紐約開設了來遠公司。「在此後五十年內，中國古董包括陶瓷、繪畫、青銅及雕刻通過他源源不斷地流入歐洲與美國各大博物館及私人收藏家中。」在誰把兩駿轉賣給盧芹齋這個問題上，周文指出有兩種說法。第一種說法來自盧芹齋，他在一九二七年九月十日致信哈里森說：「一九一五年，前袁世凱大總統下令他們正式移置北京。數月後，兩駿通過他人售於我們。」盧強調說：「這樁買賣是絕對合法的，這些石駿是由中國最高領導出售給我們的。」這種說法把矛頭直接指向袁世凱或以袁為首的最高領導。周文認為：「盧很有可能意指兩駿出售既有中間人也有後臺。」在中間人的問題

上，「從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趙鶴舫充當中間人的可能性最大。」同時，周文對「最高領導」又提出質疑：趙鶴舫借用袁的勢力從陝西牽兩駿到北京後，會不會時值國人竭力聲討袁的皇帝夢，「袁家花園」一事擱淺，兩駿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深知六駿價值的趙鶴舫或其中間人會不會得到高層領導或部門的指使或支持而將兩駿賣給盧芹齋？趙鶴舫會不會假借「最高領導」的名義盜賣兩駿？第二種說法認為是不法古董商個人的行為。根據陳重遠先生提供的情况，周文推測：「趙鶴舫把兩駿運至北京後，採取偷樑換柱的手法，把它們轉賣了。」同時又認為這種「可能性不是很大」。因為「兩駿進京之事涉及到袁世凱的兒子袁克文與陝西督軍陸建章，趙鶴舫想蒙過這兩位上層人物實屬不易。萬一此事被揭穿，帶給趙的後果不堪設想。」不法古董商是指趙鶴舫還是知道兩駿底細的其他人？「上述疑團還有待發掘國內外有關資料予以解答，希望有朝一日能將這一問題弄個水落石出。」

兩駿由誰賣給盧芹齋的問題有待進一步研究，但它們畢竟被轉賣到盧芹齋的手中，有可能被藏匿，也可能當年就離開了中國。「賓大博物館通過古董商盧芹齋直接從美國紐約獲得了昭陵兩駿，這樁買賣完全局限在相距一五〇公里的紐約與費城之間。」盧芹齋於一九一四年首次來美開拓生意，結識了賓大博物館的喬治·高登（George Byron Gordon，一八七〇—一九二七）館長，「也有可能是應高登館長參

展之邀請而來。」高登館長「具有相當高的藝術鑒賞能力，對博物館藏品的徵集具有獨到的見解，賓大博物館的現有藏品優勢基本在他的任期內形成。」他常用「借展—認購—捐贈」的創新做法使絕大部分參展品先後「成為賓大博物館的固定收藏。」

「據賓大博物館檔案室所藏資料記載，高登館長於一九一八年三月九日在紐約首次見到昭陵兩駿。」同年「四月十九日賓大博物館董事會會議記載：『館長彙報盧芹齋願意將來自古都西安府的兩塊深浮雕免費借展於我館。』以借展的方式最終達到購買的目的是高登館長與盧芹齋多年合作的「常用手法」。兩駿於一九一八年五月八日抵達費城，並由賓大博物館將碎塊拼合復原後展出。此後，在長達三年（一九一八年六月至一九二一年初）的時間裡，盧芹齋與賓大博物館經過數次曲折的磋商後，賓大博物館終以十二萬五千元購買了已在該館陳列展覽的昭陵兩駿。「賓大博物館沉浸在終獲昭陵兩駿的喜悅之中，但未曾料到購置兩駿所引起的誤解與譴責會從此伴隨著賓大博物館達大半個世紀。」這裡面牽扯到的一個關鍵人物就是卡爾·畢士博（Carl Whiting Bishop，一八八一—一九四二）。

據周文介紹，畢士博從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初任賓大博物館東方部副主任的四年時間內，曾兩次赴華探險。第一次探險歷時十六個月（一九一五年一月至一九一六年五月），主要考察了四川地區的文化遺存並為繼之而來

的賓大探險規劃作準備。第二次探險始於一九一七年三月。這次，賓大博物館規劃了中國古都西安的三年探險計畫。畢於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二日離開三藩市，在日本橫濱停留了二個月後，於五月二十六日抵達北京。由於當時中國

國內軍閥混戰、洪水沖垮鐵路等諸多不利因素，畢一路輾轉，終於在十月十四日傍晚抵達西安府。由於當時正處第一次世界大戰經濟緊縮時期，儘管畢在十月十八日向高登館長彙報的信中肯定了對陝西一帶進行大力發掘的重要性，但由於資金方面的問題，賓大博物館董事會停止了中國的探險計畫，畢遂於十二月十五日離開北京返美。「畢於一九一八年三月初回到賓大博物館後，大都在整理二次東亞探險的資料。檔案中未記載他參與兩駿的購置事宜。他在一九一八年中開始半脫離賓大博物館，年底正式離任。棄筆從戎兩年餘，任美國海軍中尉和駐華海軍助理武官。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從事考古教學。從一九二二年始受聘於美國弗利爾藝術館東方部主任直至一九四二年逝世。在為弗利爾藝術館服務的二十年中，他在中國考察達九年之久，完成了兩次小規模的發掘。」

「由於畢士博代表賓大博物館兩次赴華探險，每次都在北京逗留一段時間，廣泛接觸各界人士。一九二三年以後，畢又代表弗利爾藝術館在中國考察發掘達九年之久。他多年在華活動，必然為很多中國人所知道。當得知兩駿最終到達賓大博物館後，人們很容易把畢廣泛

的串聯活動、對文物的興趣以及在陝西的探險同兩駿被盜聯繫起來。加之格魯尚派遣的助手是外國人，中國人很可能沒有分清外國人的名字而將戈蘭茲和畢士博混為一人，張冠李戴，這恐怕是一場誤會。」

依據周文提供的資料，畢士博一九一八年春不可能再來陝西謀盜剩餘的四駿，那麼《蘇庵雜誌》所載「乃未幾復為某洋商所覬覦，竟舉陵北所餘四石輦之而去，當道者急追之，始璧還。」這裡的「某洋商」當為戈蘭茲或其他外國古董商人，有待考證。

註釋：

- 一、一說海拔一一八八米，本文依據昭陵博物館與陝西省煤航遙感中心最新測繪資料。
- 二、《唐會要》卷二十一《陵議》。
- 三、葛承雍《唐昭陵六駿與突厥葬俗研究》，《中華文史論叢》第六十輯。
- 四、同註三。
- 五、〔日〕原田淑人《東亞文化研究》，東京座右寶刊會一九四四年版。
- 六、蔡鴻生《唐代汗血馬「叱撥」考》，《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版。
- 七、《通典·突厥下》卷一九七。
- 八、同註三。
- 九、見張沛編《昭陵碑石》中《許洛仁碑》，三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 十、同註三。
- 十一、周秀琴《昭陵兩駿流失始末》，《碑林集刊》〔八〕，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二〇〇二年九月版。
- 十二、陳重遠《文物話春秋》，北京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